

# 新编文献编目

李晓新 / 主编 张兰普 杜芸 / 副主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津市高等学校“十五”重点教材

# 新 编 文 献 编 目

主 编 李晓新

副主编 张兰普

杜 芸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编文献编目 / 李晓新主编.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6.1

ISBN 7-310-02394-3

I . 新... II . 李... III . 图书编目 IV . G25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2307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肖占鹏**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 (022)23502200**

**河北昌黎太阳红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20.25 印张 499 千字**

**定价:34.00 元 (含光盘)**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23507125**

# 目 录

<b>第一章 文献编目的历史</b> .....	1
第一节 中国古代文献编目的理论与实践 .....	1
第二节 中国近现代文献编目的理论与实践 .....	4
第三节 西方国家早期的文献编目活动 .....	6
第四节 西方国家近现代的文献编目活动 .....	9
第五节 世界书目控制 .....	11
<b>第二章 文献编目概述</b> .....	16
第一节 文献编目的意义与作用 .....	16
第二节 文献编目的原则 .....	17
第三节 基本概念的讨论 .....	21
<b>第三章 文献编目规则</b> .....	24
第一节 文献编目规则概述 .....	24
第二节 几种主要的文献编目规则 .....	25
第三节 文献编目规则的主要内容 .....	32
第四节 机读目录格式结构：以 CNMARC 为例 .....	43
<b>第四章 普通图书的著录</b> .....	53
第一节 普通图书著录概述 .....	53
第二节 普通图书著录：机读格式 .....	60
第三节 普通图书著录：手工著录格式 .....	87
<b>第五章 检索点的选取</b> .....	103
第一节 检索点概述 .....	103
第二节 中文文献著录检索点的选取 .....	105
第三节 西文文献著录检索点的选取 .....	125
第四节 检索点的著录：机读格式 .....	142
<b>第六章 规范控制</b> .....	155
第一节 规范控制概述 .....	155
第二节 规范文档的著录 .....	158
第三节 规范款目著录：机读格式 .....	163
第四节 规范控制的历史发展 .....	204
<b>第七章 连续出版物的著录</b> .....	208
第一节 连续出版物著录概述 .....	208
第二节 连续出版物的著录：机读格式 .....	211
第三节 连续出版物著录：手工著录格式 .....	233

<b>第八章 其他类型文献著录</b>	246
第一节 测绘制图资料的著录	246
第二节 缩微文献的著录	259
第三节 录音与影像资料的著录	266
第四节 电子资源的著录	281
<b>第九章 综合与分析著录</b>	295
第一节 综合与分析著录概述	295
第二节 中文文献综合著录与分析著录方法	296
第三节 西文文献分析款目的著录	304
第四节 分析著录的机读格式：4--款目连接块的启用	307
<b>主要参考文献</b>	315
<b>后记</b>	317

# 第一章 文献编目的历史

文献编目的历史几乎与图书的历史同样悠久。随着文字的使用，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记录文字的图书开始出现，例如古埃及的纸莎草纸文稿，罗马的羊皮纸卷，我国的甲骨文等。随着图书的增加，就有了保存、记录已有图书的要求，图书目录以及“目录”的概念随之产生。据考古发现，公元前685年亚述王朝图书馆遗址中就有泥版目录。当时的泥版上记载有书名、流水号等内容。

在人类文化发展的漫漫长河里，对文献的整理和编目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作用。它有别于人类创造文化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这是一个对已有文化的吸收、整理、再认识的过程。站在今天广袤的文化沃土上回首望去，我们可以收获前人留给我们的文献编目、整理的丰硕果实。这些无疑是人类文化宝库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同时我们也可以体验到在时代发展的匆匆步伐中，人类的现代文明、现代技术也对文献编目领域具有深刻的影响。可以说，文献编目的历史、发展伴随着人类的文明和进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任何一个领域的细微变化都会折射到文献编目领域中。

## 第一节 中国古代文献编目的理论与实践

我国古代文化典籍是在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形成的。随着藏书典籍的增加，为了便于查找和利用，前人开始了对图书的删定、整理，逐渐创造了图书编目的一系列方法和规则。图书目录是随着对当时国家藏书的整理出现的，图书馆目录则是随着封建社会政府对图书的集中、藏书楼的建设而出现的。我国古代的学者在大量编目实践中所创造的理论、方法以及辉煌成就仍沿用在今天的图书馆目录中。

### 一、图书目录的萌芽

据记载，在孔子所处的时代（公元前551—公元前479）人民和贵族的文学作品和历史记录已经形成专门的书籍。孔子就曾对这些书籍进行选择，予以删定，加上新的标题和注释，并传给其弟子。孔子删定文化典籍在一些学者的研究中被认为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图书整理工作。

在孔子前后形成的法家、兵家、墨家、纵横家、道家等学术流派，各自整理自己的典籍，宣传自己的学术思想。在这样的学术竞争环境和整理文化典籍的过程中，产生了序述“作者大意”的方法，随之产生了“序”。序包括全书的内容提要和各篇的题解，便于对全书大意的了解。这可以被认为是现代文献目录中内容提要的雏形。

公元前4到前3世纪间，由于中央统一集权的建立，凡是对巩固统治阶级有利的各学术流派开始集中整理自己的图书典籍。整理中将每一部书的“序录”连接起来，形成了包括若干

种书的图书目录形式；同时将对每一学术流派的叙述作为一个学术思想体系的总序。于是，具有完备形式的综合目录开始出现。

## 二、图书目录事业的发展

目前的研究一般认为，我国最早的文献编目活动是自公元前 26 年至公元前 6 年（汉成帝河平三年至哀帝建平元年）西汉时期刘向（公元前 77—前 6）、刘歆（约公元前 53—公元 6）父子相继领导秘府藏书的校书编目工作。

汉代初年，国盛民安。汉武帝推崇儒学、广集天下遗书，“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公元前 32 年汉成帝继承帝位，他命“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同时命刘向“校中秘书”，刘歆与其父一同“领校秘书”。刘向等人的校书编目工作的过程是：搜集众本——将拆散的重新编整起来，重复的、错乱的篇章重新排比起来；校订文字——把错字校正过来；编定内容——写成新本。随后是分类编目——在新本的篇目后面再写叙录，叙录介绍全书的内容、作者以及对该书的评论。刘向故后，刘歆继承其父的工作，于公元前 6 年编出《七略》，同时将刘向所编的“叙录”按《七略》的体例，编成另一部较详细的提要纲目《七略别录》，即《别录》。

《七略》是我国第一部综合性的分类目录，共著录图书 13 219 卷，按类编排，分 6 略 38 种 603 家。《别录》是我国第一部较详细的提要纲目。

《七略》与《别录》虽均已亡佚，但其中所蕴涵的编目思想、采用的整理图书的方法，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首先，作为一部分类目录，《七略》以学术性质作为分类标准，其主要目的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其分类体系能够反映当时学术发展的成就和水平。其次，《七略》第一次确立了图书著录的基本方法，明确了著录格式和著录项目，同时还采用了“互见”、“别裁”等方法。这些原理、方法至今仍沿用在以现代技术编制的文献目录中。

东汉目录学家班固编撰《汉书》时，尊重刘向的编目思想，以《七略》为依据，“删其要，以备篇籍”。这样，在《汉书·艺文志》中保留了《七略》的大致容貌及主要内容。因此，也有人认为《汉书·艺文志》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国家藏书目录。

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战乱频仍。至晋朝统一时，两汉文化逐渐衰弱，新文化因素逐渐发展。西晋武帝时秘书监荀勗依据三国时魏郑默编修国家藏书目录《中经》修成《中经新簿》（也称《晋中经簿》）。荀勗也是“依刘向别叙，整理记籍”。荀勗所修《中经新簿》的主要成就是：改七分法为四分法，这是四部分类的起点。但四部仅以甲乙丙丁排列，没有具体类名。

东晋初年，著作郎李充整理当时的国家图书馆藏书，以荀勗的《中经新簿》为标准，将乙、丙两部互换。从此国家图书馆的藏书均沿袭这一方式，四部分类法开始流行。

自晋荀勗编修《中经新簿》，私家藏书目录也在不断发展。具有代表性的有王俭（452—489）所编的《七志》和阮孝绪（479—536）所修的《七录》。《七志》包括当时的国家图书馆藏书和私人藏书。王俭尊重《七略》的分类方法，并适应当时文人习惯于七分法的要求，仍将图书七分。阮孝绪的《七录》共著录图书 37 983 卷，另有佛经 6 538 卷。《七录》著录的图书完备，每一书名之下均有说明，比当时的其他书目更重视说明事项。

魏晋到隋的 300 年间所修的官私目录至今均已失传。唐贞观年间，魏征等人所修的《隋书·经籍志》，是我国现存的第二部最古老的综合性目录。《隋书·经籍志》是根据隋代和梁代国家藏书目录和隋代遗书编制而成的，它对整理图书活动具有的重要意义是：虽沿用四部分类

法，但为每一部均确定了类名，即经、史、子、集，以后的四部分类法均以此为标准；采用先著录书名、后著录著者的方法，奠定了我国图书目录先书名、后著者的基本著录形式；对图书的真伪、亡佚、残缺等情况分别注明，成为图书款目中稽核项的开端。

唐代以后，印刷术的发展使文化典籍得到更广泛的传播。这一时期，官修目录众多，私人藏书目录也得到发展。著名的官修国家书目有王尧臣、欧阳修编的《崇文总目》。私人编修的史志书目有欧阳修的《新唐书·艺文志》。其中南宋初年尤袤（1127—1194）的《遂初堂书目》，是现存最早私人藏书目录，也是著录版本的第一部目录。以后直到明朝后期，宋元版本受到珍重，著录版本的方法才得以完善。唐代的国家藏书目录主要有《群书四部录》、《古今书录》等。明代的国家藏书目录具有代表性的有《文渊阁书目》、《内阁书目》等。其中《文渊阁书目》将各类藏书按《千字文》字序顺次标识，各字之下再标以橱柜号码，方法独特。明祁承邺（1562—1628）的《澹生堂藏书目》，运用了丛书整套著录的方法，有固定的子目，并有意识地运用分析著录方法揭示文献的篇章内容。

### 三、图书目录事业的成熟

清代是我国古代图书编目活动走向成熟的时期。图书目录数量和质量均有较大的发展，专门的编目机构也开始完善。清于敏中（1714—1780）等所修的《天禄琳琅书目》，著录了图书的刊刻时代、地点和收藏家姓名等，初步建立了出版项，并且完善了版本项。特别是乾隆 54 年完成的《四库全书总目》被公认为我国古代图书目录编目方法和优秀传统的集大成者，成为中国古代提要目录的典范。

《四库全书总目》共著录图书 3 461 种，79 309 卷，以及未收入《四库全书》的存目 6 793 种，93 550 卷，基本包括清乾隆以前我国古代的著作。《四库全书总目》按经、史、子、集四部四十四类编排。这一分类方法成为以后统一的分类标准。它的提要也成为学者的读书指南。

### 四、中国古代主要编目著作

中国古代的杰出目录学研究者众多，在他们所从事的一系列研究活动中均表现出卓越的目录学思想。但从理论上进行系统研究与总结的当推郑樵、章学诚等人。

郑樵（1104—1162）字渔仲，宋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和目录学家。南宋初年，郑樵编撰《通志》200 卷，其中的《校讎略》是一部目录学的理论著作。郑樵的编目理论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图书分类上主张“详明图书类例，剖析学术源流”；其二，对图书的著录主张“通录图、书之有无”，“详今略古”。编目的目的是使图书目录成为保存历史文化的记录，查找历史事物形象线索的工具；其三，在著录内容上，强调编制详简得当的注释，同时又认为“泛释无义”，提出：“于疑晦者则释之，无疑晦者则以类举”。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清代历史学家、目录学家。在其所撰《校讎通义》中总结了自刘向以来中国目录学的发展及经验，并对郑樵的目录学思想和理论有所纠正和发展。章学诚的目录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目录学的方法、理论。他认为，图书目录的分类体系必须适应社会文化的发展，适应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目录的作用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第二，总结了“互著”、“别裁”方法的功用和意义，并在图书目录的编制实践中多次应用。

## 第二节 中国近现代文献编目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的近现代文献编目事业经历了借鉴、探索、引进和与国际规则接轨的发展历程。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文化不断输入我国，新兴出版物日益增多，原有四部分类体系的书目已不能容纳这些新的出版物。1897年康有为（1858—1927）编制的《日本书目志》和1896年梁启超（1873—1929）编制的《西学书目表》是放弃四部分类法而自编分类体系的书目。20世纪初期的中国开始兴办有别于封建藏书楼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图书馆。1904年的《古越藏书楼书目》创造了一种新旧图书统一的分类法，至今被认为是对原有书目体例的一次改革。

“五四”运动以来，倡导科学、民主的新文化思潮渗透到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对图书馆的影响也极为深刻。在文献编目活动中，这种影响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卡片式目录开始流行。辛亥革命以后，我国只有极少数的高等学校图书馆开始使用卡片式目录。而五四运动以后许多只有书本式目录的图书馆，逐渐改用卡片式目录。第二，图书馆目录的类型不断增加。除了传统的分类目录外，还出现了书名目录和著者目录。一些图书馆还为外文图书编制了书名、著者、主题混排的“字典式目录”。

与此同时一些有识之士不断撰文介绍西方国家图书馆的编目理论和方法，并主张将英文图书的编目条例应用到中文图书的编目中。我国的文献编目活动逐渐脱离了传统目录学领域，图书馆目录成为查检馆藏图书的重要工具。中国图书馆开始了现代意义上的图书编目活动。1931年，刘国钧根据英美编目理论并结合我国的目录学传统，制定了《中文图书编目条例（草案）》，当时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中央图书馆和一些大学图书馆都采用这一条例。《中文图书编目条例（草案）》分上、下两编。上编论著录项目，首先阐述了通则，然后依次规定了书名、卷数、著者、版本、稽核事项、附注、标题、参照、别出、互见、注释笺证校勘之书、附刻合刻合订、丛书、官书及机关团体所发行之书、翻译之书以及期刊的著录规则。下编论著录格式，所列著录格式图例包括基本格式及各种书名、著者、标题款目及参照款目格式，最后阐述了根查和导片的制作方法。刘国钧的《中文图书编目条例（草案）》是我国第一部现代意义的编目条例，对我国编目活动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这一时期，各图书馆编制藏书目录的活动也相当踊跃。国立北平图书馆于1936年开始发行印刷卡片目录，供全国图书馆采用。当时的中央图书馆也于同年发行相同性质的印刷目录。抗日战争爆发后，两馆的这一工作均被停止了。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图书馆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但由于缺少统一的编目规则，图书馆各自为政，图书馆目录的整体质量不高。1958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等单位合作，分别组成中文、西文、俄文3个图书卡片联合编辑组，陆续编印发行了3个文种图书的统编卡片。这是新中国全国性集中编目的开端。1959年5月，中文图书提要卡片联合编辑组出版了《中文图书提要卡片著录条例》，西文统编组也于1961年初出版了《西文普通图书著录条例》。

这一时期，文献编目理论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刘国钧先生的《图书馆目录》一书。书中融合了前苏联的文献编目理论和我国建国后图书馆编目活动中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详细阐述了编目理论与方法，为新中国第一部文献编目条例的产生奠定了

理论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文献编目事业迅速与国际接轨，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国际编目领域迅速发展的大潮中，我国的图书馆学界敏锐地认识到文献著录标准化的趋势和机读目录的研制是当前编目领域发展的制高点。

1974年北京图书馆中文统一编目组成立，恢复了中文目录统编卡片的编制和发行工作，并重新制订了《中文图书著录条例》。此后全国图书馆的编目工作陆续开始恢复。《中文图书著录条例》后经修订，1979年定名为《中文普通图书统一著录条例》正式出版。1981年又修订再版。《中文普通图书统一著录条例》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建国以来图书著录的经验，规定有六个著录项目，以书名基本款目标目，各项著录规则都有示范图例。北京图书馆曾经以此编制铅印卡片，许多图书馆也纷纷采用它作为编目规则。该条例是新中国正式出版的第一部中文文献著录规则，在推动我国文献著录标准和规范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79年4月中国标准化协会加入国际标准化组织（International Standard Organization, ISO）。同年11月成立了全国文献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六分委员会——目录著录分委员会。1980年7月在镇江召开了“全国文献目录著录标准化学术讨论会”。1983年至1987年，中国国家标准总局正式颁布了《文献著录总则》（GB3792.1-83）以及针对各类型文献著录的一系列国家标准。这一系列国家标准的制定既尊重国际编目领域已取得的研究成果，依据《国际标准书目著录》的原则、目的，确定了著录项目及标识符号等，同时又考虑汉语言文字的特点和我国读者的检索习惯，保留了我国文献编目中一些传统的做法，并且还借鉴了其他国家和地区汉语言文字目录著录规则中一些有益的规定。

《文献著录总则》及各分则的颁布与实施是我国文献著录工作走向标准化的重要标志。目前，这一系列国家标准已被广泛接受并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同时也为机读目录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1979年，北京图书馆等单位联合成立“北京地区机读目录联合协作组”，引进美国国会图书馆的MARC磁带加以研制。至此，我国文献编目领域对机读目录的研制进入实质性阶段。1980年，国家颁布了《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GB2312-80）；1982年又颁布了《文献目录信息交换用磁带格式》（GB2901-82）；1992年《中国机读目录通讯格式》（China MARC Format, CNMARC），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1995年《中国机读目录格式使用手册》由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2001年《中国机读目录格式使用手册》（修订版）出版。

1987年国家文化部、新闻出版署等部门共同组成中国在版编目领导小组，我国图书在版编目工作启动。1990年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布国家标准《图书书名页》（GB12450-90）、《图书在版编目数据》（GB12451-90）并于1991年3月1日实施。目前图书在版编目已成为图书出版中的组成部分。

1985年中国图书馆学会依据《英美编目条例》（第二版）编辑了《西文文献著录条例》。这一条例虽没有正式出版，但它在统一、规范我国西文文献著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03年7月《西文文献著录条例》（修订扩大版）由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

1996年10月《中国文献编目规则》（第一版）出版，并由全国情报文献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和中国图书馆学会共同推荐使用。该编目规则的编制以适应国际文献工作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实现中外文献书目信息交流为目的，以《国际标准书目著录》和我国文献著录国家标准为依据，并参考《英美编目条例》1988年修订版，是实现我国文献信息与世界各国顺利

交流的重要工具，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技术上都有许多独到之处。《中国文献编目规则》（第一版）是我国图书馆界在文献编目标准化方面取得的最重大的成果。新世纪之初，图书馆编目的工作内容、工作方式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特别是随着《国际标准书目著录》、《英美编目条例》（第二版）新版本的问世，对《中国文献编目规则》（第一版）的修订迫在眉睫。2002年6月开始，由国家图书馆主持，汇集众多编目领域的专家参与的修订小组成立。修订工作遵循面向信息化、面向世界、面向社会需求，努力实现国际书目信息顺利交流，使中文书目数据为世界共享的原则。修订工作历时三年，2005年4月《中国文献编目规则》（第二版）出版。

### 第三节 西方国家早期的文献编目活动

#### 一、财产目录向查检目录的转变

西方国家文献编目的历史同样悠久。公元前250年前后，古希腊的哲学家、诗人卡利玛科斯（Callimachus，约公元前320—前240）为亚历山大图书馆编制了一部分类目录《在全部学术领域指引人们写作之表记》。其中，将人类已有的知识分为8大部分，再细分为120大类。著录事项包括著者、文献名称等。目录按分类排列。卡利玛科斯是继亚里斯多得（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之后接管位于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Alexandria Library）的第二任馆长。他所编制的《在全部学术领域指引人们写作之表记》被认为是以著者作为主要款目和分类目录的雏形，尽管著录比较随意，但仍对后世有一定影响。

从公元4世纪起，图书目录基本是记录财产的清单。当时的图书馆以寺院图书馆为主，图书被认为是寺院的财产，极少提供给社会公众使用，因此记录图书的目录“基本上都是一份登记式的清单”（柳别茨基语）。在西方编目学研究中，称这种目录为“财产目录”（Inventory Catalogue）。

随着罗马帝国的灭亡，西方古代文化不断衰落，封建统治下的文化专制极大地妨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因此“财产目录”在进入到中世纪以后发展非常缓慢。当时的图书馆为宗教所垄断，不向社会开放，这就决定了图书馆的目录只能是记录财产的一份清单。这一时期比较特殊的是1250~1296年英国的一份题名为“*Registrum Librorum Angliae*”的目录，这一目录反映了183个英国修道院的藏书财产。该目录的主要特点是，对查不到著者的书，采用类似于主题或形式标目的著录方法。还应特别提到的是，这一目录开辟了联合目录的先河。

中世纪末期，随着西方古典文化的复苏，寺院图书馆开始向学院图书馆和私人藏书转变，藏书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大。由于财产目录著录不规范，不便于查检，因此这一时期的读者对目录的著录和组织都提出了一些要求。在这一背景下，文献编目的理论和实践都开始显现出较大的进步。

1548年，书目学家格斯纳（Conrad Gesner，1510—1565）在其所撰写的《编目方法》中提出，图书应按书型大小排架，图书款目上应注明排架号，主张编制主题索引。

1560年修士特里费利腊利（Florianus Treflreus）提出，图书馆没有目录将一事无成，主张建立由著者字顺目录、分类排架目录、主题字顺索引、保存本目录等组成的目录体系。

1595年伦敦书商蒙歇尔（Andrew Maunshall）在他的《英文印本图书目录》（*Catalogue of*

*English Printed Books*) 中提出他的编目主张。在序言中讨论了著录标目的选取方法，认为对不能确定著者的著作应用题名做标目；采用一个词集中不同书名的同一种书，这是最早的统一题名的使用。

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西方国家图书馆在进行社会教育、普及文化知识方面的作用日益突出，图书馆逐渐向全社会开放。图书馆性质的转变，决定了“财产目录”时代的终结，“查检目录”(Finding Catalogue)时代的开始。

目录检索职能的增强带来的另一变化是卡片式目录的出现。大约在 16 世纪英国人就已经发明了卡片式目录；18 世纪卡片式目录流行于法国；19 世纪传入美国。19 世纪以后出现了手写的卡片式目录。1820 年英国电报工程师协会图书馆第一次向社会公众提供卡片式目录。直到 1901 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发行印刷卡片，使卡片式目录得以推广。

## 二、17 世纪以后的编目理论与实践

随着代表新兴力量的资产阶级的兴起，17 世纪以后的西方国家的科学文化出现了飞跃发展，相应的图书馆事业也得到空前的进步。这一时期文献编目领域中也涌现出一些著名的研究者，他们的研究成为未来编目领域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基础。

### (一) 博德利的贡献

1605 年英国学者 T. 博德利(Sir Thomas Bodley)为当时藏书量仅次于大英博物馆的 Bodleian 图书馆编制了一部具有历史意义的目录——《Bodleian 图书馆目录》。在这部目录中他提出以下著录方法：

1. 编目不等于单纯地照录书名；
2. 以著者作为主要著录标目。第一次明确处理了著者与主要款目的关系；
3. 匿名著作或只知著者名不知其姓的著作取书名作标目；
4. 将著者的名和姓倒置著录；
5. 编制参照款目，并注以“Q”(Quare=See)；
6. 设立分类字顺目录。

博德利的这些主张被认为是对古代图书馆目录的总结和创新，《Bodleian 图书馆目录》也在以后的研究中被认为是西方编目史上新型图书馆目录的一个里程碑，柳别茨基评价该目录是“从清单向目录的飞跃”。

### (二) 安东尼·帕尼齐的《91 条规则》

英国的大英博物馆图书馆是由皇家图书馆和三家私人藏书合并而成的。这种藏书和目录头绪纷乱的情况要求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应制定统一的图书编目规则，以利于图书的整理和利用。当时就如何设立目录体系的问题，大英博物馆内产生了激烈的争论。一派主张沿袭传统，以分类目录为主；另一派是以当时的大英博物馆图书馆馆长安东尼·帕尼齐(Antonio Panizzi, 1797—1879)为代表的创新派，他们主张以著者目录为主导。安东尼·帕尼齐的主要论据是：第一，图书馆接待的大多数读者具有一定的专业水平、熟悉本专业的著者，也习惯于按著者检索图书；第二，他们大都要求直接按主题提供图书，而分类目录的间接性难以满足这一要求；第三，分类目录有较大的局限性，不仅读者难以使用，而且编目人员也难以掌握。争论的结果是帕尼齐的主张获得了肯定和支持，并于 1836 年编制出“Report Form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British Museum”，其中包括十七条规则。以此为基础，帕尼齐领导的一个专门

委员会经过几年的实践和修订于 1841 年正式出版了《大英博物馆印本图书著录规则》(Rules for Compiling the Catalogue in the Department of Printed Books in the British Museum)。规则中包含 91 个条款，因此也被后人称为《91 条规则》(Ninety-One Rules)。

《91 条规则》中对后世有影响的条款主要有：

1. 明确提出和坚持了著者标目的概念；
2. 采用了出版物“类型标目”，并用出版地作为副标目，以示区别；
3. 匿名著作取与著作内容相关的人名、地名或书名关键词作标目；
4. 对书名项、出版项、稽核项、附注项等作了具体规定；
5. 将著者款目、出版物类型款目和匿名著作款目合排成字顺目录。

《91 条规则》是西方国家近代以后出现的第一部最完整、最系统的编目规则，被认为是现代编目法的开端。以后，大英博物馆曾多次对其进行修订，1900 年再版时减为 30 条，1920 年、1927 年、1937 年分别再版。最后一版包括 41 条，并增加了地图和乐谱的著录。

### （三）美国最早的编目规则

1852 年美国图书馆学家 C.C. 朱厄特 (Charles C. Jewett) 为 Smithsonian 图书馆提交了一份题为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atalogs of Libraries and Their Publication by Means of Separate, Stereotyped Title, with Rules and Examples”的报告，其中所附的 39 条编目规则被认为是美国的第一部编目条例。后人将其称为《朱厄特规则》。

朱厄特所提出的编目主张也深受《91 条规则》的影响，但在《91 条规则》的基础上作了如下修改：

1. 团体出版物取机关团体名称作标目，而不是集中在“类型”一个标目下；
2. 取书名作标目时，从书名的第一个词起，而不是仅取其关键词；
3. 著者姓名，取真名而不用假名或笔名；
4. 规则中辅以实例作为说明。

朱厄特还认为，制订编目规则要为各图书馆的编目人员留有伸缩的余地；图书馆目录是揭示馆藏和检索文献的情报源；目录体系至少应设立字典式目录与分类目录；编目人员必须具备专科知识和实际操作能力，并要配备工具书。朱厄特的主要贡献在于形成了美国图书馆编目工作的独有风格，其先进主张一直被采用至现在。

朱厄特的另一贡献是于 1850 年前后提出了“集中编目”的思想，即一个国家应由一个编目中心机构集中编目，并将编目成果提供给其他众多的图书馆利用。这样既可节省人力，避免重复劳动，还可提高编目质量。集中编目理论对后来国际文献编目事业产生了极大影响。后来的“联合编目”、“合作编目”、“在版编目”等理论无不带有集中编目理论的色彩。

### （四）近代编目理论的杰出代表——卡特

19 世纪中后期，图书馆学历史中最应该记住的是美国的两位图书馆学家——卡特 (Charles Ammi Cutter, 1837-1903) 和杜威 (Melvil Dewey, 1851-1931)。虽然他们的贡献不仅仅体现在文献编目领域中，但是在他们倡议和领导下所开展的一系列编目研究活动极大地推动了美国图书馆目录工作的发展。

卡特于 1860 年受聘于哈佛大学图书馆，负责建立该馆的图书目录。尔后转赴波士顿公共图书馆负责建立该馆的印刷目录。在创立和完善新的著录方法和目录组织的同时，卡特还将图书馆目录服务于读者，向公众揭示藏书的思想放在首位，提出了对图书馆服务影响至深的

“用户至上”的理念。

在多年编目实践的基础上，同时又受到《91 条规则》和《朱厄特规则》的影响，1876 年卡特所编制的《印刷本字典式目录规则》(Rules for a Printed Dictionary Catalogue)问世。这一规则的初版包括 205 项条款，集中反映了卡特的编目思想。具有典型意义的条款有：

- 1.著者款目不仅有揭示该著者特定书名的图书的职能，而且还要有将同一著者的所有著作集中在一起的职能；
- 2.机关团体出版物集中于机构名称之下；
- 3.匿名著作取书名作标目；
- 4.建立主题目录，主题款目的标题应首先从书名中提取(即书名关键词)；
- 5.编制分析款目，并建立参照系统。

规则中还对著录格式、一些著录项目作了较详细的规定。

卡特被认为是近代编目理论与实践的集大成者。这不仅由于他在《印刷本字典式目录规则》中所提出的规则至今仍影响着图书馆的编目活动，更由于他所倡导的图书馆编目应遵循的原则。卡特认为编目工作应以方便读者、符合读者检索习惯为首要原则。他还创造性地提出了字典式目录的三种款目详简级次，以适应不同图书馆的选择。卡特还以便于检索为宗旨，提出主题目录要深入、直接地揭示文献内容，而且用词要统一，这被认为是现代主题法的开端。

无论是卡特的编目思想，还是他所编制的《印刷本字典式目录规则》，直到今天，都还一直影响着编目领域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卡特也因此成为现代编目理论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 第四节 西方国家近现代的文献编目活动

20 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对图书馆以及图书馆的文献编目活动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难以比拟的。

### 一、英美编目体系和普鲁士编目体系

1901 年 1 月 1 日美国国会图书馆开始向全国发行印刷型目录卡片，这对促进编目工作的统一和规范有极大作用。这一时期英美两国各有自己的编目条例，但作为两个有影响的英语大国，由于没有统一的编目条例，书目信息难以交流和共享。在著名图书馆学家杜威的建议下，英、美两国的图书馆协会自 1904 年起开始合作，成立了专门委员会，于 1908 年合作出版了《编目规则：著者和书名款目》(Cataloguing Rules: Author and Title Entries)。由于它是英美两个国家合作的结果，因此这一条例也被称为《英-美条例》(A-A 条例)。

《英-美条例》共 174 个条款，其中明确规定：第一，以著者做标目；第二，将机关团体分为四种类型：政府机关、协会、学术团体、其他；第三，匿名著作用书名的第一个词作标目。这一条例出版的意义在于，在编目历史上第一次两国合作编制编目规则，为文献编目的国际化提供了可能，同时也扩大了英美编目体系在世界上的影响。但是由于英美两国在连续出版物、古代贵族著作等问题的处理上仍有分歧，因此这一条例分别以英国版和北美版两种版本形式出版。

20世纪初期在欧洲大陆影响较大的是以德国为代表的普鲁士体系。普鲁士体系的标志是1908年德国皇家图书馆以《德柴茨柯规则》为基础重新编制的《普鲁士图书馆字顺目录适用规则》(*Instruktion für die Alphabetischen Kataloge der Preussischen Bibliotheken und für den Preussischen Gesamtkatalog*)。

《普鲁士图书馆字顺目录适用规则》共有241个条款，其中的一些规定与英美体系截然相反。它的主要特点是：第一，简化了各种款目的著录内容；第二，要求按照书名中的实词组织目录。第三，不承认团体著者的概念，机关团体出版物按佚名著作处理。

英美编目体系和普鲁士编目体系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图书馆编目活动有着很大影响。两部规则对立、并存了约半个世纪，在图书馆编目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以后，美国又多次对《A-A条例》进行修订。1949年分别出版了《美国图书馆协会著者和书名款目编目规则》(ALA Cataloguing Rules for Author and Title Entries)和《美国国会图书馆描述性著录规则》(Rules for Descriptive Cataloguing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 二、柳别茨基的工作与“国际编目原则会议”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图书馆学界面临着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科学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出版物数量、类型急剧增加的局面。原有的编目条例显然不适应当时的需要，编目活动中需要有系统性更强、容纳更多的文献类型、便于更多图书馆共同使用的编目条例。

柳别茨基(S.Lubetzky)长期服务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部，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1951年他应邀参加分析和修订ALA规则的工作，在此基础上，1953年他提出了一份研究报告——《编目规则与原则》(Cataloguing Rules and Principles)。这一报告被国际编目界公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编目理论著作。报告中柳别茨基全面分析了20世纪上半叶国际编目规则的发展情况。他认为以往的编目规则都是任意的、不统一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关键的原因是由于没有统一的编目原则作指导。他主张编目不仅要有规则，而且要有原则；建议编目条例应去掉许多过于专门化的规定，以便让书目编制机构和书商目录编制机构理解和接受。柳别茨基明确指出，编目工作首先应有明确的理论原则，概括地讲就是要明确目录的职能、任务和指导思想，否则就会出现任意的、自相矛盾的规定。柳别茨基的观点使国会图书馆放弃了对原有条例的修订，着手编制新的条例，并促成了1961年“国际编目原则会议”的召开，也为1967年《英美编目条例》(第一版)(*Anglo-American Cataloging Rules 1st ed., AACR I*)的出版奠定了理论基础。

1961年10月9日至18日，在巴黎召开了有53个国家和12个国际组织参加的“国际编目原则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ataloguing Principles)。会议的一项重要成果是53个国家和12个国际组织的代表一致通过了著名的“巴黎声明”(Paris Statement)，也称“巴黎原则”(Paris Principles)。“巴黎声明”包括12条55款，声明重申了柳别茨基和卡特对目录功能的认识，即：使读者能够找到图书；揭示馆藏；帮助选择图书。特别明确规定了图书馆字顺目录的职能是：第一，揭示图书馆所藏特定著者或特定书名的著作；第二，集中反映图书馆所藏某一特定著者的全部著作以及同一著作的各种版本。

“国际编目原则会议”的另一重要成果是对“英美编目体系”和“普鲁士编目体系”长期存在的分歧作了尽可能的协调，使两大体系的编目原则向同一方向发展，缩小两大体系之间的差距。因此“国际编目原则会议”也被认为是编目工作走向国际化、标准化的第一个里程碑。

根据“国际编目原则会议”以及“巴黎声明”的精神，美国图书馆协会、英国图书馆协会、

加拿大图书馆协会和美国国会图书馆在反复协商、讨论的基础上，在 1967 年出版了《英美编目条例》（第一版）。由于对“巴黎原则”的理解仍有分歧，同时英、美两国的一些传统分歧并没有解决，因此 AACR I 以北美版和英国版分别出版。

### 三、《国际标准书目著录》和《英美编目条例》（第二版）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图书馆学界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人们重新审视已有的编目理论和条例。

1964 年至 1966 年美国国会图书馆首次研制成功机读目录（MARC I），1968 年机读目录二型（MARC II）研制成功，将计算机技术成功地应用到文献编目活动中。

1966 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开始执行“全国图书采购和编目计划”（National Program for Acquisitions and Cataloging），并首创与各国编目部门合作的“合作编目”（Shared Cataloging）。

在多年实践的基础上，1968 年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编目界和出版界再次合作提出“图书在版编目”（Cataloging in Publication, CIP），并于 1971 年 6 月正式实施，以后各国陆续开展出版界和编目界合作的这一活动。

编目领域的发展，要求文献编目条例的标准化程度更高，并能适应更广泛领域和不同地区的合作，适应计算机编目技术的应用。显然，已有的编目条例（包括 AACR I）均与这一要求有差距。因此制订统一的国际著录标准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1969 年国际图联在丹麦的哥本哈根举行了一次专家会议。会议的成果之一是决定编制《国际标准书目著录》（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iographic Description, ISBD），并组成了专门的工作小组负责 ISBD 的拟订。1971 年 12 月 ISBD (M) 初稿问世，1974 年 3 月 ISBD (M) 第一标准版在英国伦敦正式出版。随后各工作小组又陆续编制出适用于不同类型文献著录的 ISBD。

ISBD 尽管是国际标准，但它仅是描述文献的标准，并不是具体的编目条例，因此 ISBD 出版后各国都在按照 ISBD 修订自己的编目条例。1978 年《英美编目条例》（第二版）（Anglo-American Cataloging Rules, AACR II）正式出版。新修订的 AACR II 遵循 ISBD 中对著录项目、著录格式、著录用标识符等的规定，并力求各类型文献的统一，为适应机读目录的发展还特别注意对计算机编目的适用。

AACR II 在世界许多国家尤其是英语国家和地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被视为编目领域的经典。1988 年 AACR II 修订本（AACR II R）出版；此后又有 1993 年和 1998 年修订本。2002 年《英美编目条例》（第二版）的 2002 年修订本问世。这一版本特别考虑了日益增多的数字化信息资源编目问题，其中的第 3 章“测绘资料”（Cartographic）、第 9 章“电子资源”（Electronic Resources）、第 12 章“连续性资源”（Continuing Resources）成为这一版本的最大亮点，第一次将集成性资源（Integrating Resources）编目包括在编目规则中。

## 第五节 世界书目控制

1949 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图书馆学家伊根（Margaret E. Egan）和谢拉（Jesse H. Shera, 1903—1982）在《编目与分类杂志》（Journal of Cataloging and Classification）发表了“书目控制引论”（Prolegomena to Bibliographic Control）一文，首次将维纳的控制论引入到文献工

作领域。在文章中，伊根和谢拉提出并阐述了书目控制的思想。他们认为：参照机械控制是一种机械能导向装置的理论，可以将书目控制看作是一种“智能导向装置”，其功用是“最迅速、最经济地从所记载的全部信息中提取与特定任务相关的那一部分”。他们还认为，在对各学科的信息进行书目控制活动中，起主导作用的应该是图书馆员，因为图书馆员具备以下条件：从事专家与外行、各学科专家之间的交流工作；有解决相似问题的经验；广泛涉猎各学科知识。

### 一、书目控制思想的演变

其实，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有人幻想编制囊括世界所有图书的书目。1545年德籍瑞士学者格斯内尔编著了《世界书目：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全部书籍的目录》，收录图书15 000种。这是迄今为止最早的编制世界书目的实践，其“广泛搜罗”的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极大。

1895年国际书目学会再次提出编制一部世界书目。比利时的目录学家奥特勒(Otlet, 1868—1944)和拉·封登(La Fontaine, 1854—1943)所编制的《国际十进分类法》即准备编制世界书目的分类法。但终因工程浩繁，这一理想未能实现。

194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了世界书目中心，编制世界书目问题被再次提出，同样，由于理论技术条件的不成熟，也未能如愿。

在伊根和谢拉发表了“书目控制引论”一文以后，195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美国国会图书馆调查部曾对书目控制一词做过进一步的说明，认为：“控制（或掌握）书目所提供的，或为编制书目而提供的手写记录和印刷记录。书目控制与通过书目的有效检索同义。”

1964年英国图书馆学会出版的新的职业考试大纲，也曾对书目控制进行定义——“对充分记录各种文献资料的系统进行开发和维护”。

此后不断有人从文献工作的各角度对书目控制加以解释。由于众说纷纭，有人甚至对书目控制实现的可能性产生疑虑。1967年第3期的《图书馆趋势》的前言就认为，书目控制是乌托邦式的理想。196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份文件中也认为，书目控制是“一个多种解释的术语，仅表达了一种已经证明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终极理想”。

1968年威尔逊(Patrik Wilson)的《两种能力——论书目控制》(*Two Kinds of Power : An Essay on Bibliographical Control*)一书出版。威尔逊认为，书目控制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具有两种能力，即开发控制和描述控制。开发控制是指“最充分利用一批文献的能力”。描述控制是指“按任意顺序排列一批文献，以便人们能够驾驭它们的能力”。

20世纪60年代机读目录的诞生为世界性书目控制带来新的希望。1971年西德巴伐利亚图书馆馆长卡尔特瓦瑟(Franz Geory Kaltwasser)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图书馆通讯》第25卷上发表了《世界书目控制》一文，正式提出了世界书目控制(Universal Bibliographic Control, UBC)的概念。卡尔特瓦瑟的世界书目控制思想不再希望通过一个国际机构，编制囊括无遗的世界书目，而是要求文献生产国提供本国的文献数据，并通过世界机读数据系统提供给各个国家。世界书目控制的思想从此具有了操作的可能。

### 二、世界书目控制规划

1971年，在国际图联的利物浦大会上，会议主席利泊尔斯(Herman Libaers)提出建立一项UBC的长期规划。他认为，UBC与国际图联的各项工作均有关，国际图联应为此作出